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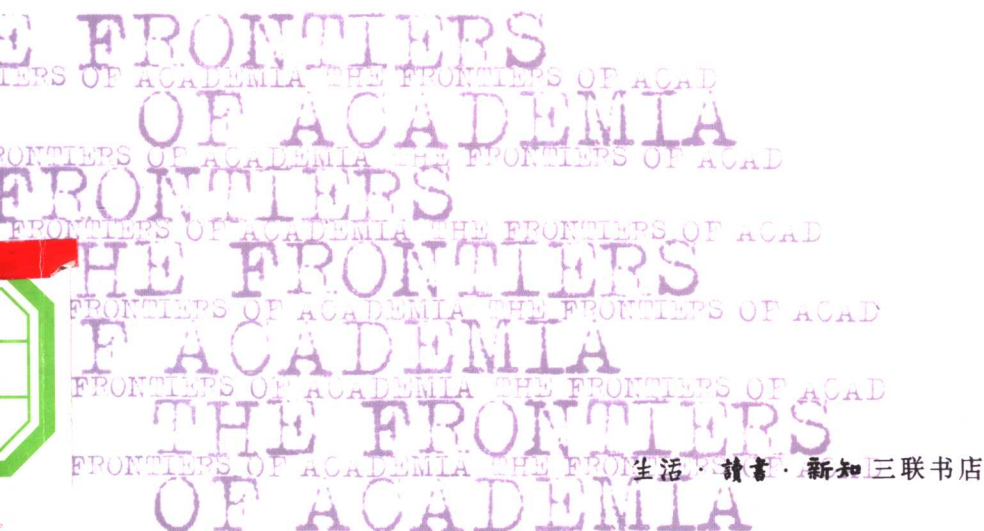
反思现代性

Reflections on Modernity

S. N. Eisenstadt

S. N. 艾森斯塔特 著

旷新年 王爱松 译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作为现代化理论“修正派”的代表性人物,艾森斯塔特
力主“多元现代性”概念。他认为多元现代性的一个共同核
心是“高度的反思性”,理解当代世界——实际上是解释现
代性的历史——的最好方法,是将其视为文化方案多样性
不断构建和重构的一个故事。

本书在宏观的历史比较中分析了现代性在西方社会和
非西方社会不同时期的不同发展模式,并对现代化的“经
典”理论和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的古典社会学分析以及当
代的“文明的冲突”论与“历史的终结”论提出了自己的不同
看法。

ISBN 7-108-02544-2



9 787108 025449 >

定价: 23.80 元



学术前沿

THE FRONTIERS OF ACADEMIA

反思现代性

S. N. 艾森斯塔特 著

旷新年 王爱松 译

生活 读书 · 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06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反思现代性 / 艾森斯塔特著; 旷新年, 王爱松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 10
(学术前沿)
ISBN 7-108-02544-2

I. 反... II. ①艾...②旷...③王... III. 社会学 -
理论研究 - 文集 IV. C9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69948 号

责任编辑 冯金红
封面设计 罗 洪 崔建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图 字 01-2003-5814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版 次 2006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14.125
字 数 314 千字
印 数 0,001-7,000 册
定 价 23.80 元

学术前沿

总序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素来重视国外学术思想的引介工作,以为颇有助于中国自身思想文化的发展。自 80 年代中期以来,幸赖著译界和读书界朋友鼎力襄助,我店陆续刊行综合性文库及专题性译丛若干套,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良好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世界格局的急速变化,学术思想的处境日趋复杂,各种既有的学术范式正遭受严重挑战,而学术研究与社会—文化变迁的相关性则日益凸显。中国社会自 70 年代末期起,进入了全面转型的急速变迁过程,中国的学术既是对这一变迁的体现,也参与了这一变迁。迄今为止,这一体现和参与都还有待拓宽和深化。由此,为丰富汉语学术思想资源,我们在整理近现代学术成就、大力推动国内学人新创性著述的同时,积极筹划介绍反映最新学术进展的国外著作。“学术前沿”丛书,旨在译介二战结束以来,尤其是本世纪 60 年代之后国外学术界的前沿性著作(亦含少量二战前即问世,但在战后才引起普遍重视的作品),以期促进中国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反思,并回应当代学术前沿中的重大难题。

“学术前沿”丛书启动之时,正值世纪交替之际。而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历经百余年艰难曲折,正迎来一个有望获得创造性大发展的历史时期。我们愿一如既往,为推动中国学术文化的建设竭尽绵薄。谨序。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年 11 月

中译本前言

收在本书中的论文,集中分析了现代性和现代文明的几个关键方面。这些分析的共同核心,是多元现代性观念——也就是这样一种观点:一方面强调现代性作为一种独特文明的特殊性,一方面强调其中的具体制度和文化模式的巨大可变性和易变性。

据此本书分为三编。第一编是对现代性文明及其可变性的某些独特特征的分析。第二编是本书篇幅较长的一编,是对现代性在现代性的古典时期(也就是民族国家和革命国家时期)在不同社会中发展模式的分析。收在最后一编中的各章,讨论的是当代舞台所有现代性模式的巨变——超越了民族国家和革命国家——其基本特征之一是宗教维度作为现代性构成中的一个中心成分重新复苏。

S. N. 艾森斯塔特(Shmuel N. Eisenstadt)

目 录

中译本前言	1
导 言 比较进化观框架中的多元现代性概念	1
第一部分 现代性的文明	17
第一章 全球化时代的多元现代性	19
第二章 多元现代性	36
第三章 野蛮主义与现代性:现代性的破坏因素	67
第四章 迈向 21 世纪的轴心	79
第二部分 多元现代性	107
第五章 最初的多元现代性:美洲文明	109
第六章 日本和现代性文化方案的多元性	136
第七章 镜像现代性:日本和美国现代性 宗教前提之比较	160
第八章 印度民主之谜的文明框架	200
第九章 中国历史经验和中国现代性的某些方面	271
第十章 原始原教旨主义运动建构中的 异端、宗派主义和乌托邦主义	285

第十一章	有关穆斯林社会公共领域 现代转型的一些观察	344
第三部分	当代舞台	361
第十二章	现代性的文明架构、历史经验和 文化方案 ——现代社会中抗议的构建	363
第十三章	超越民族国家和革命国家模型的霸权	394
第十四章	宗教领域的重建：超越“历史的终结”和 “文明的冲突”	409
译后记		441

导言 比较进化观框架中的 多元现代性概念

—

在下面的篇幅中,我打算将多元现代性的概念置于比较进化观(社会科学)的语境中。古典结构进化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分化”:文化和社会的分化与进化概念。各种各样的进化理论,从古典的进化理论,到由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和他的一些追随者在 60 和 70 年代详加阐发的更新版本的进化理论,都高度强调这一维度,并且,这一维度已经受到来自多方面的猛烈抨击。

毫无疑问,在其最初版本中——它强调按一种普遍的进化尺度衡量所有社会的单线发展,强调所有制度领域的分化间的融合,以及社会互动的结构—组织维度和象征维度间的融合——这种进化观已经岌岌可危。

但是,尽管遭遇到种种批评,这一进化观里还是具有一个强大的真理内核:也就是说,认识到了人类活动不断扩张的趋势,以及社会活动的不同成分或维度日益与它们所嵌入的框架脱离、且日益相互分离的趋势。

分化过程也许可以视为这种扩张趋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这种分化过程的核心,是“从前”相互嵌入的行动逐渐分离。这种分化的产生,也许既关涉到社会互动和结构的结构维度,也关涉到社会互动和结构的象征维度。

在结构层次上,这种“分离”(decoupling)的主要过程是结构性分化的过程,也就是特殊的、有组织的独特角色(例如职业角色,其本质完全不是被牢牢地嵌入诸如不同的家庭或地方环境中)成形的过程,新的整合机制相应发展的过程。在象征层次上,这种分离的过程,最为明显地表现在主要文化取向的相互脱离——也就是文化取向日益分离而不同的编码成分日益自主。这种分离,通常与本体论的现实和社会现实的概念日益问题化(problematicization)联系在一起,与越来越倾向给定的现实之外的某些现实联系在一起,并且与日益增长的反思和再思联系在一起。在从内在取向到超越取向的转变中,或在集体的不断建构和体制合法化的模型经由原初模型到市民模型和超越模型的转变中,可以看到这种分离的一些最重要例证。

然而,与古典的进化和结构—功能分析的假设相反,结构性分化的不同维度、文化取向的相互脱离、对人类存在根源的理解的日益问题化,并不总是能协调一致。我们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结构—进化观的重估,就源于承认这一事实。

这一重估基于认可这一事实:社会行为和文化取向的不同维度的分化,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不需要、也并不总是能协调一致。这种重估的至关重要一点,是以下二者间的区分:一方面是包含着结构性分化核心的劳动社会分工;另一方面是所谓基本的精英功能——也就是适应劳动社会分工体制所派生出的问题

的那些功能或活动。由劳动的社会分工建构派生出来的种种问题——根源于无处不在的劳动社会分工——被社会学之父（尤其是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视为社会秩序体制的最重要维度。这些社会学之父强调，（现代社会“市场”的）劳动社会分工的建构，在社会秩序的每一基本维度方面（即信任、权力调节、意义和合法化的建构方面）产生了不确定性。正因为如此，他们断言，如果这些方面或问题没有得到关注，任何具体的劳动社会分工和任何具体的社会秩序都不可能维持。因此，所有这些社会学家都强调，社会互动的任何持续模式的建构和“生产”，都基于劳动分工的组织结构同信任的建构、权力的调节、社会互动的不同模式的合法化的某些结合之发展。

换言之，为了确保社会互动的任何模式的连续性，也就是社会互动的相对延续的界限的连续性，似乎必须加以“关注”的正是这类问题——权力调节问题，标明条件的信任、团结、合法化与意义的建构问题。正是这些问题，界定了体系的趋势和敏感性，持续互动的“需要”或先决条件，并且得到社会学的“结构—功能”学派的高度强调。然而，与结构—功能方法通常的阐释相反，这类需要和先决条件的具体规范，并不是这些体系的某些“内部”特点赋予的，即不是由技术发展或结构分化的水平赋予的，而是受到特殊社会进程的影响，其中，意义的建构发挥了关键作用。适应这些问题的社会活动可以被定义为精英功能，并且的确也区别于劳动的社会分工所产生的那些功能。

然而，在相关著作中，这种区别并没有得到充分认识。考察这种区别及其对社会学分析的意义，构成了这里将要提出的结构—进化观的出发点，或者说对结构—进化观的重估。

二

这种重估,将首先基于我最近三十年所从事的从分析帝国的政治制度入手的比较宏观社会学的某些研究。

在关于帝国的研究中,我确认精英活动的场所是在它置身其间的社会或阶层的中心——这是一个由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创造的概念,他后来将这一概念与对奇里斯玛概念的重新分析结合在一起。在《帝国的政治制度》一书的1969年平装本导言中,我首次考察了中心和中心—边缘的关系的概念的分析维度,并且将它们运用于比较分析中。这种分析强调,中心和中心—边缘关系作为中央集权的帝国(原则上,是所有社会)之制度设计的一种独特分析维度,具有重要意义。它强调这一维度没有包含在劳动社会分工的结构性分化范围之内。

在这一分析中,社会的一个或多个中心不仅被认为和劳动社会分工的组织方面有关,而且涉及劳动社会分工的组织方面与社会秩序的奇里斯玛维度间的关系。也就是说,社会中心与这样的企图联结在一起——试图将社会生活、制度形态的世俗现实与被人类视为存在、生命及其困境的根源的东西联系起来。

但是,不同社会之间,中心自身互不相同,而且在任何单个社会里,中心也不必是同质的。大体上,这种体制的各自中心之间的差异,是根据它们的结构性和象征性自主、其独特性、其活动类型、与边缘的关系及其应变能力进行分析的。

一般而言,帝国以中心的相对高度的独特性和自主、中心试图渗透边缘、边缘对中心的冲击相当有限为特点。正是中心的这种独特性,使诸如罗马、拜占庭一类帝国、许多穆斯林帝国、欧

洲的专制主义国家区别于埃及或印加(Inca)、阿兹特克帝国一类更家长式专制统治的帝国。

业已表明,甚至在帝国里,中心的这些各种各样的成分并不总是协调一致,而且每一种成分在不同中心里也许有不同程度的表现,从而产生出统治精英的不同控制模式。反过来,这些差异与支配一个特定的中心和社会的精英联盟的性质紧密联系在一起,与它们所倡导的文化取向紧密联系在一起。结果,不同的中心和社会呈现出了变化多样的结构和动力。

《帝国的政治制度》的平装本导言,迈出了对不同类型中心的分析的第一步。在我主编的有关《政治社会学》读本的不同部分的导言中,这一分析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这里,中心和中心—边缘关系的独特性得到了描述——在不同类型的体制,如部落社会、城邦或世袭体制中得到了描述。根据它们的结构性和象征性自主、其独特性、其活动类型、与边缘的关系及应变能力,这类体制的各自中心之间的差异得到了分析。

三

在社会的结构分化的类似阶段,可以发现中心的结构和制度动力的这种变异,现代社会的发展同样如此——并且正是在这里,多元现代性的概念上场了。“多元现代性”的观念,指的是关于当代世界的某种观点——实际上是有关现代时期的历史和特征的某种观点,这种观点与学术话语和一般话语中长期流行的观点恰好相反。它与1950年代流行的现代化的“经典”理论和工业社会趋同的观点相左,并且实际上与马克思、涂尔干的古典社会学分析相左,并且(在很大程度上)甚至与韦伯的古典

社会学分析——至少是对他著作的一种解读——相左。它们都假定,尽管只是含蓄地假定,在现代欧洲发展起来的现代性文化方案和那里出现的基本制度格局(constellations),最终将为所有正在现代化的社会及现代社会照单全收;随着现代性的扩张,它们将在全世界流行开来。

但是,出现的现实证明根本不同。所有或大部分社会的实际发展表明,各种各样不同的制度领域——经济的、政治的、家庭的领域——持续地呈现出了相对自主的维度。这些相对自主的维度在不同社会 and 不同发展时期,以不同方式走到了一起。的确,当代的发展并没有证实这种“趋同”假设,而是突出了现代社会极为丰富的多样性,即使经济发展方面相似的社会,如主要工业资本主义社会——欧洲社会、美国和日本,也是如此。桑巴特在 20 世纪初几十年里系统阐述的古老问题“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证明最早(即使还只是暗含的)认识到了这一事实。甚至在西方——在欧洲内部,尤其是在欧洲和美洲之间——美国、拉丁美洲(Latin America),或者更确切地说,拉丁美洲各国(Latin Americas),也产生了深远的可变性。

在现代性的文化和结构维度之间的关系方面,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一种非常顽固的——尽管是暗含的——现代化研究的假设,已经变得十分可疑。这一假设即:现代化的文化维度——也就是西方现代性的基本文化前提,是内在地、必然地与结构维度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然而,虽然最初的西方规划的不同维度确实构成了整个世界不同社会发展进程的重要出发点和持续参照点,但这些社会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现代性最初文化方案的同质化维度和霸权维度。

现代性确实蔓延到了世界大部分地区,但却没有产生一个

单一的文明,或一种制度模式,而是产生了几种现代文明的发展,或至少多种文明模式,也就是产生了多种社会或文明的发展,它们具有共同的特征,但依然倾向于产生尽管同源、但迥异的意识形态动态和制度动态。此外,超出了现代性最初前提的深远变化,也一直在西方社会中发生。

尽管有时人们假定,现代发展的欧洲模式会在美洲重复上演,但现在真相大白,北美、加拿大和拉丁美洲,从一开始就是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发展的。实际上,在整个美洲,我们可以追踪到新文明的成形,而不只是如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所断言的只能追踪到欧洲的“碎片”。极有可能,这是自伟大的“轴心”文明诞生以来新文明的第一次成形,而且是迄今为止最后一次成形。美洲现代性的成形证明,即使在西方文明——无论怎样定义——的大框架内,产生的也不只是现代性的一种而是多种文化方案和制度模式。

四

这一多元现代性观,需要有关现代性本质的某些假设。首先,现代性应当被视为一种独特文明,具有独特的制度和文化特征。根据这一观点,现代性的核心是对世界的一种或多种阐释方式的成形和发展,按照科尔涅利乌斯·卡斯特里阿蒂斯(Cornelius Castoriadis)的说法,是一种独特的社会“想像”(imaginaire)的成形与发展,实际上是一种本体论图景、一种独特的文化方案的成形与发展,与一套或几套新的制度形态的发展相结合——正像我们随后将会更详细地看到的,空前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是其核中之核。

这一文明,这一具有其制度含义的独特文化方案,首先在西欧成形,然后扩张到欧洲其他地区,扩张到美洲,后来扩张到整个世界,产生出不断变化的文化和制度模式。这类文化和制度模式,构成了对现代性的独特文明前提的核心特征中固有的挑战和可能性的不同反应。

现代性的文化和政治方案

五

现代规划,即现代性的文化和政治方案,当最初在西方,在西欧和中欧产生时,不仅带来了独特的意识形态前提,而且带来了独特的制度前提。它带来了人的能动性(agency)、自主性和人在时间之流中的位置的观念发生某些急剧转变。它带来了未来观念,在这种未来观念中,可以凭借自主的人的能动性——或者凭借历史的步伐——得以实现的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是开放的。这一方案的核心是,社会秩序、本体论秩序和政治秩序的前提和合法化不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了;不仅围绕权威的社会、政治秩序基础,而且围绕基本的本体论前提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反思意识——甚至现代性方案最激进的批评者都具有这种反思意识,尽管他们原则上否定这种反思意识的合法性。

现代性文化方案的核心,也许已经由韦伯进行了最成功的系统阐述。诚如詹姆斯·D·弗边论述韦伯的现代性概念时所言:

韦伯在对他所说的“伦理公设”的某种解构中发现了现代性的存在阈限,这一“伦理公设”就是:“世界是由神意注定的,因而是一个有意义的和伦理取向的宇宙……”

他断言——无论如何,从他的断言中也许可以推导出来——现代性的阈限在于,宇宙为神意注定的合法性衰落了;只有当设定的宇宙合法性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不再无可非议时,才会有现代性,才会有这种或那种现代性。反现代的人拒绝这种非议,仍然相信……

我们可以从中推导出两个命题:第一,形形色色的现代性,不论它们还可能包含其他什么内容,都是对相同的生存问题的回应。第二,形形色色的现代性,不论它们还可能包含其他什么内容,都恰恰是一些对该问题无所触动的回应,透过这种回应而系统表述的有关生活与实践的观点既没有超出这一问题,也没有否认这一问题,而是处在这一问题的框架内,甚至服从这一问题……^①

正因为所有这样的回应都不去触动这一问题,通过现代性方案产生的反思意识才超越了轴心文明中生成的那种反思意识。现代方案中的反思意识,不仅集中在一个或几个社会中流行的超越图景和基本本体论概念的不同诠释的可能性之上,而且发展到质疑这类图景和与之相关的制度模式的给定性。它使人们意识到,许多这类图景和模式存在着,并且这类图景和概念的确可以争辩(Eisenstadt, 1982, 1986)。^②

这种意识与现代性规划的两种重要成分紧密相关。在丹·

① James D. Faubian, *Modern Greek Lessons. A Primer in Historical Constructiv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13 - 115.

② S. N. Eisenstadt, "The Axial Age: The Emergence of Transcendental Visions and the Rise of Clerics", op. cit.; idem, ed., *The Origins and Diversity of Axial-Age Civilizations*, op. cit..